

〔法〕让-路易·居尔蒂斯著

赵坚 译

一对年轻夫妇



Is65.4
184
1

中国文联出版社



040494



一对年轻夫妇

〔法〕让-路易·居尔蒂斯著

赵坚 译

Un Jeune Couple
Jean-Louis Curtis

Julliard 1967

France

一对年轻夫妇

〔法〕让-路易·居尔蒂斯 著

赵 坚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2 插页 132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4050册

*

ISBN 7-5059-0105-2/I·71

书号：10355·1105 定价：1.75元

火星人？现代人？

——代译本序

这是一对年轻夫妇。男的叫吉尔，女的叫维罗妮克。蜜月旅行，海滨度假，找房子，生孩子，工作，社交，争吵，离婚，这就是他们的故事。一点儿也不复杂，一点儿也不曲折，就象生活本身一样平淡，就象生活本身一样单调。然而这故事曾经使许多人感到震惊，他们突然发现，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中，当他们不顾一切地追逐物质享乐，自以为跟上了时代潮流的时候，或者当他们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他们在社会等级的台阶上又登上一级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或者正在失去某种更为宝贵的东西。

一位年轻的女性不甘心过平凡而没有光彩的生活，或者就是耐不得清贫，向往另一种生活，也许是富有，也许是奢华，也许是冒险，也许是时髦，也许是强烈的情感经验，甚至可能是性质各异的叛逆，总之是她不愿在原来的轨道上继续下去了，她要摆脱，要反抗，要重新开始。这

样的故事我们听过许多次了。一百三十年前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六十年前有莫里亚克的《黛莱丝·戴克茹》，现在（也已经是二十年前了）我们又有了让·路易·居尔蒂斯的《一对年轻夫妇》。

当我看到《一对年轻夫妇》出版于1967年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刚才提到的那两本书，因为《包法利夫人》出版于1857年，《黛莱丝·戴克茹》出版于1927年。1857年，1927年，1967年，这年代的巧合难道暗示出它们之间的某种联系吗？我相信这多半是偶然之神的安排，但我仍禁不住要把它们联系起来，而《一对年轻夫妇》不再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似乎也具有了某种隐秘的含义。

福楼拜的爱玛原本是个农家少女，但是修道院里公开或私下的教育和熏陶，使她那敏感而脆弱的脑袋里充满了月下小艇、林中夜莺、落难命妇、白羽骑士一类旖旎的幻想。可惜她嫁的是一位“谈吐就象人行道一样平板”的乡下医生，外省小镇生活的平淡庸俗自然也不能象荒塚落日那样引动时髦的忧郁情怀。她自认不该过这样的生活，她向往着“动乱的生涯、戴假面的舞会、闻所未闻的欢娱、一切她没有经见然而应当经见的疯狂爱情”。但是，当她决心实现自己的追求的时候，她迈开的第一步却是落入一个风月老手的魔掌之中，此后便是一步步的堕落。她周围的人，除了那一直蒙在鼓里的丈夫外，只是看着她在泥淖中挣扎，甚至有落井下石或趁火打劫的，却谁也不肯拉她一把。沉沦是这一类女人很容易踏上的一道斜坡，往

往又收不住脚，非滑到底不可。福楼拜把爱玛放在幻想和现实的夹击之中，让她“和希腊女神一样庄严”地出现在法庭上，在她服毒的时候自己仿佛也尝到了砒霜的苦味。福楼拜对一个堕落女子的深切同情同时就是对社会现实的无情指控，而这个现实就是资产阶级刚刚巩固了自己的胜利就立刻失去了英雄的色彩，露出了平庸猥琐、唯利是图的本相。

莫里亚克的黛莱丝是个很普通的富家女儿，她所以异于周围的人，是因为脑袋里“很有些不对头的想法”。她是一个在外省的令人窒息的空气中挣扎的不安份的灵魂，她不断地寻求真实的自我，然而她始终不能从平庸自私的丈夫那里得到一丝一毫的理解。尽管如此，她仍不想“虚情矫饰，保住面子，改弦更张”，不想“对一切习以为常，变得麻木不仁，躺在家庭的怀抱中昏沉睡去”。她向往着另一个天地，过另一种生活，“在巴黎做个单身女子，自食其力，谁也不靠……连家也不要！”她投毒未遂，然而她并没有失足者的悔恨，也没有失败者的屈服，她高昂着头接受了她的行为的后果。她告别了丈夫，独自留在巴黎，在黑暗中摸索，寻求着光明。“她可以羞死，急死，恨死，累死，但绝不会无聊而死”。她确信：“哪怕烧死，也比麻木不仁强！”莫里亚克对黛莱丝怀着极为复杂的感情，他象同情一切因种种原因而遭到不幸的妇女一样，深切地同情着黛莱丝，并且通过她无情地撕破了资产阶级蒙在家庭上面的有时神圣、有时温柔、但终归是虚

伪的面纱。这是在本世纪初的偏远的外省，那里仍旧是闭塞、沉闷、保守、冷酷的。那里的家庭仍旧是一座牢笼，囚禁着无数的爱玛和无数的黛莱丝。

福楼拜同情爱玛，不是同情她的那些无根的幻想，而是因为她是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实的牺牲品，她总算是比安分守己但是庸俗猥琐的资产者多了一点追求的热情。莫里亚克爱黛莱丝，不是爱她投毒害夫，而是因为她有一颗需要拯救的灵魂，她没有那种自以为是的骄傲和满足，她在上帝面前因有罪而更谦卑，因此也更容易投入上帝的怀抱。从这里我们看出了不信上帝的福楼拜和“写小说的基督徒”莫里亚克之间的区别。让·路易·居尔蒂斯和他的这两位前辈又有不同。

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位不甘寂寞、渴望着改变环境和地位的女性，然而她的故事的时间、地点和她在故事中的位置都明显地不同了。时间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人们用“占有和感觉”评价人生的时代，地点则是巴黎，这地方本身就已经是爱玛和黛莱丝梦想的一部分了。而她的名字，维罗妮克，在她的丈夫看来，也是“过于讲究，有故意追求高雅的意味”。她竭力扮演着现代女性的角色，拼命追赶着最新的潮流，“决心不放过任何新的物质消费和新的文化娱乐”。唯有如此，她才感到没有“虚度光阴”，她才觉得“与同龄人和世界紧密相连”。然而这一切非有钱不办，于是她就失望，就痛苦，就恐惧，就千方百计地试图“改造”她的丈夫，使其能够满足她的种种欲

求。她年轻，漂亮，却已经失去了新鲜的血肉，她的真实的自我消失在“汽车”、“家用物品”之类“美的东西”之中了，其结果是她始终在不自觉地“演戏”，演给自己看，也演给别人看，让虚荣心在假象中得到满足。这是一个在无休止的欲望中煎熬的女性，她后来准备嫁给一位富翁，她可能会有一段心满意足的生活，然而她最多也不过象一颗假钻石，发出的光纵然耀眼，却是单薄的，飘忽的，虚假的。因此，维罗妮克的向往、追求和虚荣虽然汇合在一股难以抗拒的潮流之中，却由于受到吉尔的顽强抵制而显得虚妄和可悲。小说的题目是《一对年轻夫妇》，这似乎暗示出，维罗妮克已然失去了爱玛和黛莱丝那样的地位。她不再是中心，不再是主角了。她已经失去了作者的同情，她得到的只是微含嘲讽的惋惜和怜悯。作者把同情甚至赞赏给了吉尔，这个被妻子称为“火星人”的、力图维护爱情的自足性和纯洁性的“小工程师”。

有人可能会说，吉尔是个时代的落伍者。然而他的“落伍”有着多么深刻而复杂的内涵啊！他在席卷整个社会的消费和享乐的浪潮中竟然不肯为了金钱而抛弃人格的独立和感情的真实，他的失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不思变计，虽曾陷入痛苦的思索，却终于坦然受之。这在“那种不十分聪明却在身体上和道德上符合时代要求的人”，即那种“具有运动员一样的体魄和面露贪婪的人”看来，可以归入“不识时务”或“理想主义”一类，因而是可笑的。但是必然会有另一些人，即那些精神上更为健

全的人，会认为他的固执是可敬的。认为他可笑的人，实际上怕他，因为他撕破了他们的假面。认为他可敬的人，实际上爱他，因为他是一个明眼人，以自己的失败告诉人们究竟在猜取和占有的过程中失去了什么更值得珍视的东西。

吉尔的失败是不必讳言的。他本来是一个“体型很好”的青年，然而不会也不愿象时髦青年那样去修饰，这在妻子的眼中就成了“缺少风度”。他是一个“认真”

“自觉”的工程师，然而他究竟不能在高等住宅区为妻子提供一套豪华的住房，甚至在“找房子”和“找一套房子”之间不加区别。他不肯为了较高的报酬而把灵魂出卖给通用汽车公司，妻子不但不支持反而说他“疯了”。他喜欢文学艺术，甚至想系统地学习哲学，妻子却让他“尽量写些轻松的东西，能卖得出去的东西”，给小家庭添“一笔额外收入”。他在威尼斯兴致勃勃地参观博物馆和教堂，欣赏大师的杰作，妻子却想放弃委罗内塞，在高级宾馆住上一夜，哪怕“当一次一个晚上的富翁”也好。他本想保护心爱的妹妹，使之免遭不适宜的娱乐和交往的腐蚀，却被妻子讥为“太保守”，“充满偏见”。他把人们疯狂地追求物质享受视为庸俗，并且竭力与之保持距离，谁知妻子并不欣赏，反而兜头一盆冷水，说他这样的人“在拉丁区的小酒店里俯拾即是”，到了半夜服务员把他们“和锯末烟头一块儿扫出去”。他蔑视人人羡慕的“成功”、“金钱、排场和社会荣誉”，然而这却被妻子说成是“缺乏适应能力”，“跟不上潮流，总显得呆头呆

脑”。他痛恨所谓“汽车文明”，那种汽车阶级关于停车困难之类的抱怨，在他听来是“令人讨厌的废话”，而在熟悉汽车牌号的妻子听来，却成了“一首优美绝伦的咏叹调”。当他没有足够的手段来满足妻子的日益增长的欲望时，他希望妻子能和他一样，把青春视为最大的财富，然而妻子却等不得，她要立刻“就获得一切”。他终于按捺不住，为妻子的朋友、“现代社会的女强人”阿里亚娜勾勒了一幅维妙维肖、充满讽刺意味的肖像，却被妻子认为是影射自己，从而导致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并且决定了两个人的离异。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吉尔的失败，使他成了一个茕茕孑立的“火星人”。他所希望的那种“只需要所爱的对象在场而不需要其余的一切的感情”，他的那种“把所爱的对象当成目的、唯一的目的、唯一的追求”的爱情观，经受不起物欲的冰水的浸泡，挽留不住把幸福看作“只是一个银行存款问题”的妻子。

吉尔的失败并不仅仅在于他失去了妻子的“爱情”，更在于他与这个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心甘情愿地选择了失败。他并非不知道法国已经摆脱了战后的贫困，进入了相对富裕的消费社会，他也不是禁欲主义者，更不是苦行僧。他只是希望为了妻子本身而爱妻子，为了艺术本身而爱艺术，就象一个普通人那样，从爱情中得到爱情本身所能给予的快乐，从艺术中获得艺术品本身所能提供的愉悦。然而，做一个普通人，这在维罗妮克的眼中，就已经是失败了。那么这个社会

人人渴望的成功究竟是什么呢？对于一个中小资产阶级的法国人来说，无非就是在高等住宅区拥有舒适的住房，拥有名牌的汽车，到地中海俱乐部推荐的地方去度假，住高级旅馆，到豪华饭店去吃饭，有机会涉足某种社交圈子，结交几位名人，甚至只须时常知道他们的行止，以便在谈话中用作炫耀自己的资本，等等。说到底，就是用钱可以买到的那些东西。在适应这个社会的那些人看来，所谓“成功”，就是有钱，而有钱，就能够幸福。法国有一句古谚：“金钱造就不了幸福。”现在这个法国则不同，它把一切都建筑在金钱上面，幸福自然也在其中。它把幸福变成一种神话，甚至一种梦魇，令其日夜折磨着人们的头脑，使他们唯恐枉此一生而未曾幸福。这种无名的恐惧驱使着人们拼命追求一切有关幸福的外在标志，并将其浓缩为两个词：占有和感觉。这个社会被称为消费社会，吉尔和维罗妮克之间的爱情的毁灭，充分地暴露出所谓消费社会的虚伪和矫饰，及其对人性的扭曲和戕害。那么谁是这个社会的成功者呢？当然是维罗妮克羡慕的那些人，例如她的朋友阿里亚娜。

阿里亚娜并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但是她的地位实在是比维罗妮克的更为重要。她是后者的领路人。说到两种价值观的对立，实际上是吉尔和阿里亚娜之间的对立。吉尔的态度，对维罗妮克，是怜悯，最多是怨而不怒，而对阿里亚娜，则是鄙视，甚至是痛恨。然而他鄙视甚至痛恨的，并非阿里亚娜其人，而是这位“现代女强人”所

代表的那种价值观念。这位阿里亚娜满口“妇女责任”，而且要“完全肩负”，她作为女人，要“完全获得自由”，要“享受全部公民权益”。可惜这都是时髦的套话，实际上她的“责任”、“自由”、“公民权益”是什么呢？她欺骗丈夫，却偏要和他装扮成一对“模范夫妇”，只因为丈夫“是供养者，是支持者，为她提供保障、舒适的生活和某种地位”。她想“同时占有一切，即使是不能并存的东西，丈夫和情人，家庭和独身生活，平静和放荡；她想同时成为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和一个自由的女人，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强人；她想体面做人，却又幻想行为荒唐，她想恪守职责却又不愿做出牺牲，她想获得平静的幸福，却又追求疯狂的幸福”。这是一个表里不一、装腔作势、时刻都在演戏、失去了真实自我的人物，是一个消费社会成批生产的模式化的、一成不变的产品。其成分是自私、虚荣、附庸风雅和强烈的占有欲；其特点是矫饰、赶时髦、用无目的的忙乱掩饰心灵的空虚和孤独，从而获得一种紧张生活的假象；其功能则是充当“治国专家和政权掌握之中的最为驯服的社会成员”。

阿里亚娜的重要不仅仅在于她是维罗妮克的启蒙老师，更在于她是一种典型，代表着“法国的年轻资产者”：他们“衣着得体，办事迅速，胜任工作，思想模仿左翼”。这种典型正是“受到巨大威胁的西方人的、即白人的尊严”的藏身之处。他们是这个社会制度的产物，却又喜欢批评这个制度，摆出一副左得可爱的面目；他们可

以大谈反对战争、第三世界的贫困、种族主义者的暴行、富有者的良心不安，等等。话题很是时髦，然而谁也不能指望他们会为此而牺牲一分钟的享乐。他们朝思暮想的成功之一，是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再爬上一级，例如打入某个限制很严的社交圈子，或者降格以求，以认识某位名流或富翁为荣，再不行就装出热爱文学艺术的样子。然而他们对文化完全采取占有的态度，而不是出于天性的流露，也不是为了“陶冶性情”，甚至也不是为了“单纯娱乐”。在他们看来，文化及其衍生物乃是“一种使自己超越普通人的手段”，使他们得到一种“属于社会精华”的假象。这些人也许并非没有独特的感受，但他们“宁愿服从报纸的指令，而不相信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的自然的反应”。于是，他们就有了一系列“必读”的书籍，“必看”的电影或展览，“必听”的音乐，“必须”欣赏或指责的作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认为一切晓畅明白的东西肯定都是肤浅的，反之，文笔晦涩则表明思想深刻”。他们大概从未认真读完过一本书，却可以仿佛深有体会地说：“他的书很难，甚至相当乏味，必须坚持读下去，但是值得一读。”其实他们是一些最为浅薄的人，他们所以时时都装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无非是从某个时候起，以艰深掩饰浅陋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而在他们看来，“最宝贵的原则是要赶上时髦的最近一阵浪潮或者最近一班船”。这是一些附庸风雅的人，然而所谓“附庸风雅”，吉尔突然意识到，在六十年代的法国已经由一个贬

义词变成一个褒义词了，它意味着：“风度翩翩，举止文雅，在寻欢和交友中挑挑拣拣。”真是天晓得！他们无非是戴上一种假面，表示自己若不是上等人，至少也不是普通人。贬义也罢，褒义也罢，它表示的仍旧是“一种与时髦相近的素质”。可是谁知道呢，也许时髦也已经变成一个褒义词了。不过吉尔究竟是不讲情面的，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这种附庸风雅“实际上成了一种时代病，一个巨大的精神毒瘤，长在所有的人特别是中产阶级身上”。这精神毒瘤所包藏的毒素自然不止“附庸风雅”一端，其它如有关幸福和成功的神话，对“占有和感觉”的崇拜，日益增强的物质的诱惑等等，也都尽在其中。它已经而且还在继续腐蚀着人们的灵魂，毁灭着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感情，传播着种种虚假的价值标准。而使这种精神毒瘤得以生长繁衍的土壤正是所谓消费社会的非人道本质，“它本身就充满了虚伪、谎言和无耻，它污染了一切”。再加上领导阶级的腐朽，（吉尔说：“它能够把火箭送上月球，但它毕竟是腐朽的。”）这种精神毒瘤就蔓延得更快，更广，成为一种时代病。

福楼拜曾就他的爱玛说过：“我的可怜的爱玛夫人，不用说，就在如今，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落受罪、哭泣！”莫里亚克也曾就他的黛莱丝说过：“没有暴露的、不为人知的悲剧为数更多。上帝知道被裹藏在家庭秘密之中的东西有多少！我的黛莱丝·戴克茹有众多的姐妹。”这都是惟恐人们不信，而力辩其有。我想居尔蒂斯

用不着说这样的话了，因为维罗妮克那样的女人之多乃是有目共睹，而如吉尔者却有可能日渐其少，也许有人竟会认为这种“火星人”本属子虚乌有，是作家杜撰出来为那些“失败者”解嘲的。无论如何，在以“占有和感觉”为评价人生的唯一标准的社会中，吉尔这种人是只嫌其少而不嫌其多的。我能够感觉到，作者写到他时是颇有些激动的，并且赋与他一种准确的、尖锐的、有时近乎残酷的讽刺能力，使他能够清醒地、冷静地审视这个社会，并对其虚妄的、反人性的本质提出严正的指控。而他终于没有被妻子改造成一个有“适应能力”的人，又使我感到某种快意，因为在一股席卷全社会的消费和享受的浪潮中，他保留并且珍爱着成功者们失去的东西：真实的感情和真实的幸福。

郭宏安

1987年3月，北京

附记：让-路易·居尔蒂斯先生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我和赵坚同志曾经合作，于1982年翻译过他的小说《夜森林》（当时他的名字被译作让-路易·吉尔第），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居尔蒂斯先生最近被选入法兰西学院，成为四十个不朽者之一。我和赵坚同志，一以此序，一以此译，在北京向居尔蒂斯先生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并感谢他允许我们翻译并出版他的著作。

内 容 提 要

吉尔和维罗妮克本可以象很多人一样，幸福地生活下去。但在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中，一个狂热地追求所谓的现代化生活，而另一个则对此嗤之以鼻，他们之间的爱情终于因此遭到毁灭……

本书作者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的小说《夜森林》曾获龚古尔文学奖。

“显然，那个宫殿的一个房间，阳台对着泻湖，和我们的小旅馆完全不同……你不认为我们可以花钱在那里住一夜，只住一夜，最后一夜吗？你看得多少钱？”

“也许一万里拉吧。”

“这不算什么！我们去享受一夜？最后一夜？”

“再说吧。这取决于我们的开支。星期四或星期五，告诉你是否可以。”

“我真想啊，你懂吗？当一次一个晚上的富翁。”

“如果我们放弃巴尔巴罗别墅，我认为我们可以设……”

“巴尔巴罗别墅是怎么回事？”

“一个帕拉第奥式的别墅，有壁画，是……”

“那我们别去了！”

“……委罗内塞^①的作品。”

“我们参观了那么多博物馆！还有教堂。绘画和所有

^① 意大利画家（1528—1588）。——译注